



## 城市农业

作者:朱莉安娜·路易斯 (**Juliana Torquato Luiz**)、乌斯奇·席尔瓦 (**Uschi Cristina Silva**)、安德烈·比亚索蒂 (**André Ruoppolo Biazoti**)

城市农业(UA)并不仅仅指城市空间的农业生产,它指的是在城市和大都市地区建立,且与农业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和生态关系。它是一种多规模的农业,其中大部分与生活空间有关。在不同情况下,城市农业都被认为是一种建立城市权以及获得健康和充足食物权的实践。城市土地是其主要基础,各种主体赋予了城市农业实践多重含义。我们从系统性和多用途的视角,对城市农业进行解读。我们分享了几个让其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的核心问题。全国城市农业集体(CNAU)也为这篇文章贡献了极具价值的内容,该组织由各种参与者组成,他们倡导通过城市农业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并结合生态农业原则,在巴西粮食和营养安全的社会政治参与背景下,一直在努力制定一项全国性的城市农业政策。

城市农业:孕育中的概念

农业的发展与城市化和城市生活直接相关。在印加、玛雅和阿兹特克等古代文明的文献和研究中，可以看到粮食生产与城市形成方式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城市中，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生产的粮食养活自己。例如，今天位于墨西哥城南部的“Las Chinampas”，就是一种将占用湖边土地的方式与城市结构相结合的祖传农业类型。在加纳、巴基斯坦、印度、伊拉克和中国进行的研究也表明，城市生产自己的粮食，并拥有复杂的灌溉、土壤管理和有机废物处理系统(Van der Ryn, 1995年; Smit; Nasr; Ratta, 1996年)。

20世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理背景下，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城市农业实践日益凸显。从这些实践背后的大环境中产生的经验、规模、空间、主题和词汇也多种多样。

在Almeida(2015年)看来，“城市农业”的概念是一个开放的、有争议的领域。作者认为，城市农业应突出反思农业与城市之间的历史关系，以及当今世界相关问题与农村和城市、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的联系(Almeida, 2015, 第53页)。

从这个角度看，特别是在过去30年里，城市农业反映了多种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不可分割的，这取决于其发生的背景：粮食安全和主权问题；劳工问题；韧性和获取城市自然资源(如土地和水)的机会；住房条件；生物多样性、城市规划、环境教育、集体健康、心理健康、紧密的营销网络、大城市农业食品系统、生态农业等。

这么说，“城市农业”的概念构建是动态的，也是争取民主城市权利的斗争中的一环，与霸权性的城市化、私占城市空间以及霸权性生产模式相对立。因此，“城市农业”实践是反对城市空间商业逻辑的具体行动的代表，揭示城市空间的虚拟性，反对自上而下建立的资本主义行为和城市规划。

生态农业是一门科学、运动和社会实践，而城市农业近年来才被纳入这一领域，尽管各种现有经验表明，生态农业也是与历史城市改革运动斗争相融合的实践结构范式。其在巴西的实践包括近年来的民众运动，以及农村劳动者组织(MST)和Sem Teto等组织在城市环境中设立定居点。

从实践主体来看，城市农业还包括各种社会群体：妇女、渔业社区、家庭农场主、土著群体、前逃亡黑奴社区、河边社区、城市中的其他传统社区、年轻的生态农业从业者以及其他赋予城市农业不同形式和表现活力的群体；农村、菜园、后院、农场。它们可以是个人、家庭、集体(社区基地或协会)和社会运动的实践。人们用传统方式种植粮食、药用植物、观赏植物和饲养牲畜，供自家和邻里直接食用；但他们也像家庭农业一样，拥有自己的地方市场(集市、新鲜产品篮子分销)和更复杂的结构，如组织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动，以及机构性市场。

从空间维度来看，城市农业应用于住宅区，包括住宅和公寓、后院、楼板、露台、屋顶、农场、空地、路边、街道、广场、花园和没有建筑物的公共场所。在学校、托儿所、疗养院、监狱、保健中心、大学、协会和其他公共或私人机构等机构环境中也很常见。城市农业服务

所在的空间结构甚至有助于恢复生态绿色走廊，并融入城市森林系统以及其他具有绿地特征的空间类型。如果被占用的土地和财产没有发挥其社会功能，那么这种区域也构成城市农业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不同城市空间应用的农业有可能同时实现多重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城市的粮食需求，尽管城市农业对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恢复社区文化和知识的贡献无需赘述。它以民主价值观、社会、环境、经济和文化公正为基础，构成了捍卫另一种社会项目的更广泛的进程。

这样，城市中的农业实践就有了农业生态学和民众基础的指导。这一概念要求我们以辩证的方式对待城市空间中的既有要素，包括长期以来抵制使用城市环境中可用自然资源的经验，并在政治上承认那些被不平等的社会体系所忽视和边缘化的不同社会主体对生态系统和社会的贡献。

## 城市空间和城市权

正如**Singer (1985年)**所指出的，在巴西和全球南方的许多地方，城市化的发展方式与北方国家不同。作者认为，南方的城市问题主要源于缺乏适当的住房，自来水供应和污水处理等城市服务效率低下，卫生和教育系统失灵等。

城市被简化为一个生产中心，由政治、政府、工厂和市场组成。与此相反，农村被定为粮食生产地和自然之地。城市从这些功能中分离出来。模式发生了转变，社区纽带断裂，关系破裂，公有土地、地方传统和机构的组织以农业社区结构为中心。捍卫私有财产和以供求为导向的自由市场由此产生。

**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巴西工业化进程吸引了大批工人涌入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轴线上的城市。对巴西城市化的一种批判性观点认为，农村工人的迁徙引发了社会空间的转型。从农村背井离乡的农民在城市空间中被边缘化，转变为工业后备军 (**Singer, 1985年**)。

城市空间的产生和城市发展的复杂性不仅与工业化有关，也与服务业的发展有关，服务业已成为一种典型的城市积累模式。随着非正规工作的增加，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降低，工人自费寻求再生产和生存，正是在城市空间形成了对这些工人的新剥削。这些工人还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这是建立工业和庞大的服务业必不可少的要素 (**Oliveira, 2013年**)。

城市对包括食品在内的产品的需求增加，使资本有机会通过更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渗透到巴西农村。另一方面，这也使得空间专业化程度更高，经济功能更加明确。这些局限于城市空间的历史进程加深了农村-城市的二元对立，分割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一种支离破碎的生活观和空间观 (**Kois; Morán, 2015年**)。

然而，城市空间的产生不仅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土地所有者、房地产开发商和国家干预的结果。边缘化主体也生产城市空间(Corrêa, 2016年)，具体的例子包括住房运动、大都市区的定居点、贫民窟、唐人街和占领市中心等日常斗争。

在这些地方，城市农业实践重新设计了城市空间和景观。取缔闲置土地的是社区花园、广场和休闲区。围绕这些集体活动，出现了针对下列问题的讨论——获取健康和充足食物的权利；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城市以及如何建设城市权利；城市外围的暴力问题；城市流动性和环境卫生问题。在符号维度，人们更加重视前人知识和记忆、大众美食、克里奥尔种子(即本土种子)、药用植物和团结关系。

城市中的这些经验是“再存在”的孤岛，在城市空间中刻画了其它生活方式，与资本主义强行植入城市的制度背道而驰。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城市的膨胀和乡村的凋敝，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Foster, 2012年)，造成了环境失衡，也产生了过量废弃物；另一方面，人们在城市农业中的实践则引导我们建设重视生命再生的空间，重新将城市社会与自然联系在一起。

#### 城市农业或可重新组合社会与自然

之前还有观点谴责了在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下，城市生态组成部分被剥离的现象。一方面，自然的完整形象得以延续，一种“观赏空间”被人为地复制，社会与自然分离，自然被视为“物品”加以支配、利用和保护，以保留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消费文化造成了对自然产品的浪费以及严重的污染和环境退化。

这种环境不平等也表现为社会不平等。穷人最容易受到“因其住宅位置易受洪水、山体滑坡和开放式下水道影响而产生的风险，以及空气、水和土壤污染的影响”(Acselrad, 2000年，第2页)。

各地的城市农业经验表明，城市环境不仅是消费和废物生产的场所，也可以是以生态农业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生产空间，这些实践恢复了自然，而自然是城市以及城市空间生产的一部分。

其中一个例子是认识到城市是养分的生产者，通过处理和管理城市有机废物，这些养分成为农业投入，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十分重要。人们不再将有机废物视为垃圾，而是将其视为循环的一部分——它来自大地，又回归大地。这一新模式遵循生态系统原则，也是本文所倡导的城市农业概念的一部分。

在城市中生产食物的人们通过“城市农业运动”组织起来，质疑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还原论和二元论观点，并要求通过民主推倒这种论调，使城市空间中的农业食品作物重新组合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从而生产丰饶的食物(Biazoti, 2020年)。

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必须认识到城市农业的跨行业性和大众性，并将以实现美好生活为目标的政策落到实处。为生活而服务的农业是否能通过与农村的协作，再次为城市提供食物，将取决于另一种形态的城市是否能够实现。

资料来源:改编自《农业生态学与教育词典》一书中发表的文章,第51-57页,第1版:2021年9月。[人民之声出版社](#)

#### 参考资料

1. ACSELRAD, H. Justiça Ambiental: novas articulações entre meio ambiente e democracia. In: Brazilian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Analyses (IBASE), Central Única dos Trabalhadores (CUT) (RJ), Institute for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and Planning (IPPUR UFRJ). 工会运动与环境保护:国际辩论》。里约热内卢:2000年,第3版,第7-12页,2000年。
2. ALMEIDA, D. A. O. de. Urban agriculture: this and that. In: COSTA, H. S. de M.; MONTE-MÓR, R. L. de. Teorias e práticas urbanas. Belo Horizonte: C/Arte, 2015.
3. BIAZOTI, A. R.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urban agriculture: the power to act in São Paulo's community gardens. 论文(应用生态学硕士)。圣保罗大学ESALQ/CENA, 2020年。
4. 共和国总统府。民事院。法律事务分内阁。2001年7月10日第10.257号法律。对《联邦宪法》第182和183条进行了规定,制定了城市政策的一般准则并做出了其他规定。见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leis/leis\\_2001/l10257.htm](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leis/leis_2001/l10257.htm)。访问日期:2021年3月5日。
5. \_\_\_\_\_。共和国总统府。民事院。法律事务分内阁。2006年7月24日第11.326号法律。2006年7月24日第11.326号法律。见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_ato2004-2006/2006/lei/l11326.htm](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_ato2004-2006/2006/lei/l11326.htm)。访问日期:2021年4月29日。
6. CORRÊA, R. L. On social agents, scal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 text for discussion. In: CARLOS, A. F. A.; SOUZA, M. L. de; SPOSITO, M. E. B. The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agents and processes, scales and challenges. São Paulo: Contexto, p. 41-51, 2016. 圣保罗:Contexto, 第41-51页,2016年。
7. FOSTER, J. B. The Ecology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Social Struggles, n.28, p.87-104, 2012. HARVEY, D.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São Paulo: Martins Fontes, 2013. São Paulo: Martins Fontes, 2013. KOIS, J. L. F. C.; MORAN, N. Raíces en el asfalto: pasado, presente y futuro de la agricultura urbana. 马德里:Libros en Acción, 2015.

8. OLIVEIRA, F. de.《批判二元理性:鸭嘴兽》。圣保罗:Boitempo, 2013年。
9. SINGER, P.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isation.圣保罗:巴西利亚出版社, 1985年。
10. SMIT, J.; NASR, J.; RATTA, A. Urban agriculture: food, jobs, and sustainable cities.纽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96年。
11. VAN der RYN, S. The toilet papers: recycling waste and conserving water.加利福尼亚州索萨利托:生态逻辑设计出版社, 1995年。